

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

学术研讨会

论 文 提 要

一九九八年八月·太原

目 录

1. 关于三晋文化研究的几个宏观理论问题.....	李元庆 (1)
2. 三晋文化的历史特色.....	王志华 王尧帆 (4)
3. 三晋文化的道德光辉.....	康金声 (6)
4. 论三晋文化的核心精神.....	赵瑞民 (7)
5. 二十一世纪呼唤“晋学”.....	张有智 (8)
6. 呼唤“晋学”或“晋文化学”是深入拓展三晋文化系列研究的客观需要.....	高增德 (10)
7. 晋与三晋国家的文化在中华文化总体中的地位 and 影响.....	秦培华 (11)
8. 关于三晋文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李仁和 (13)
9. 试论三晋文化研究的原则及方法.....	刘振华 (14)
10. 三晋文化: 理论的构建.....	马志超 (18)
11. “关公文化”在三晋文化思想中的核心意义.....	孟繁仁 (20)
12. “忠”、“义”思想在三晋文化中的地位及影响.....	张建英 (21)
13. 地理促动与三晋文化的形成.....	杨晓国 (22)
14. 胡汉杂居与三晋文化.....	白占全 (24)
15. 《诗经》与三晋文化.....	王建堂 (27)
16. 从“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看周初唐国社会.....	武文选 范全红 (28)
17. 晋国霸业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的计量分析.....	杨国勇 (30)
18. 晋国兴亡之梗概.....	赵文礼 李遇春 (32)
19. 春秋后期晋国六卿由税制变革正.....	林宏跃 (38)
20. 晋无公族制度的形成及其历史影响.....	杨秋梅 (39)
21. 晋侯墓地玉器的动物造型和动物纹饰艺术.....	宋玲平 (40)
22. 晋文化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侯 毅 (41)
23. 论晋文化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	孙开泰 (42)
24. 《周易》对晋文化的影响.....	李孟存 (43)
25. 晋国文化特征简析.....	魏宗贵 (44)
26. 论晋国法律文化的特点.....	王霄燕 (45)
27. 作州兵与晋国军事文化.....	卫文选 (46)
28. 浅探晋国青铜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张德光 (47)
29. 晋赵魏韩的历史发展与疆域变迁.....	王天祚 (49)

30. 试论赵国的政治发展.....	张德一 (51)
31. 赵文化与胡族文化.....	王建华 (52)
32.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魏孝文帝“汉化改制”.....	管芙蓉 (53)
33. 古魏城与《诗经·魏风》.....	景昆俊 (54)
34. 三晋魏国疆域考.....	冯长荣 (56)
35. 从魏韩南迁看晋文化在中原的传播.....	王大良 (58)
36. 论战国时期三晋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	郭丽萍 (59)
37. 法家与三晋.....	马玉山 (60)
38. 三晋多法家的文化思考.....	张有智 (62)
39. 三晋变法运动的当代思考.....	高专诚 (63)
40. 韩非法思想之特色.....	周子良 (64)
41. 商鞅出走的文化反思.....	张红萍 (65)
42. 三晋儒家的命运.....	高专诚 (66)
43. 三晋名家思想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张晓芒 (67)
44. 三晋人材问题历史回顾和现状.....	马斗全 (68)
45. 从晋国智氏家族的灭亡看用人之道.....	张巩德 (69)
46. 人材与改革决定着国家的兴亡.....	周庆义 (70)
47. 统一安定是国家兴亡的决定条件.....	周庆义 (71)
48. 从楚材晋用到晋材楚用的反思.....	楚 刃 (72)
49. 春秋祁地初探.....	赵荣达 (73)
50. 古曲沃在闻喜之考辨.....	张贵保 (74)
51. 晋国早期都城“唐”地的研究.....	陶正刚 (75)
52. 晋国迁都新田透析.....	柴继光 (76)
53. 介子推隐居地再考辨.....	剑生 (77)
54. 虞坂古道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宋万忠 陆峰波 (78)
55. 战国上党郡县考.....	谢鸿喜 (79)
56. 论上党地域文化的特点.....	李仁和 (80)
57. 春秋战国时期三晋的姓氏.....	袁义达 (81)
58. 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军事家先轸.....	王志华 王晓枫 (82)
59. 以黑为孝,始于晋国.....	刘俊礼 (84)

关于三晋文化研究的几个宏观理论问题（研究综述）

山西社科院 李元庆

李玉明主任在拙著《三晋古文化源流》一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今后应加强有关三晋文化的理论和方法、首先是宏观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以期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尽快赶上和超过国内地域文化研究的先进水平。依据这一精神，本文将主要就近年来学者们对几个宏观理论问题的研究予以疏理或综述，以之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料。

一、关于三晋文化的断代分期问题

大体上有三类观点：

一是苏秉琦、王克林先生以“作为考古学命题”的晋文化的源头“陶寺文化”为上限，以秦统一前为下限，分晋文化为四期。

二是吉琨璋、吴振禄先生以晋文化考古与晋国历史发展相结合，以叔虞封唐为上限，以秦灭三晋为下限，分别作出了关于晋文化的“三期分法”和“五阶段分法”。

三是笔者从整合“三晋古文化”及其“源”、“流”的视角，把上至原始社会早期、下至封建社会末期山西地区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序列，也就是“三晋古文化”自其“源”而至“流”的演化序列，区分为“三晋古文化的历史渊源”（自远古至西周）、“三晋古文化自身”（自西周初至战国末）和“三晋古文化的遗风余韵或历史流变”（自秦汉至明清）等三个历史层面。

二、关于三晋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断代分期”和“区系类型”，是分别从纵向（时间序列）和横向（空间界域）两个角度作宏观研究，以共同确定三晋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区系类型理论是苏秉琦先生创建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他称这是“理解中国文化的纲”。“区”指“大块块”即“大文化圈”；“系”指“条条”；“类型”指“大块块”中的“小块块”即“分支”。该怎样确定三晋文化的区系类型呢？以下是四位先生所作的分析：

一是苏秉琦先生依据他关于中国古代“六大文化区系”的划分，提出“晋文化考古”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或侧面”。其中，晋南和晋北分别属于“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整体上，它是中原、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的“枢纽”或“纽带”。

二是田建文先生在确认山西考古学文化南北处于“中原”和“北方”两大区系的“纽带地域”，东西则为“秦晋”和“华晋”两文化区的“割据前沿”的基础上，从“山西具有区域单元地理结构复杂的特点”出发，综合了山西考古学者的思想，把山西文化分为晋西南、晋南、晋东南、晋北、晋西北和晋中等六区，并指出在某些区内还可“单列出”相对独立的小区。

三是刘纬毅先生依据“自然与人文情况”的“地域差异”，提出“三晋文化可分为四个文化区”，即晋南“河东文化区”，晋中“并州文化区”，晋东南“上党文化区”和晋北“雁门文化区”。

四是笔者依循苏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和“晋文化考古”思想，根据山西自远古以来，其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的基本特点，提出关于“两个小地域文化圈”的划分，即以晋南地区为主体的“河东文化圈”和以晋北地区为主体的“雁门文化圈”，并指出，它们是“构成三晋古文化有机统一整体的两大重要支系”，同时，还在“关于三晋古文化研究的三大理论层次”的方法论构想中，把对两大支系的研究列为“中观理论层次”的研究范畴。

三、关于三晋文化的历史特点问题

从考古学文化看，“历史特点”问题可以说是“区系类型”研究的延伸，又可以说是确立“区系类型”的依据。因此，分析三晋文化的历史特点，应密切联系有关晋文化考古的区系类型理论。以下是四位先生所作的分析：

一是苏秉琦先生从晋文化作为中原、北方两大区系的“枢纽”，指出它“明显区别于其他区系的考古学文化”的本质特点在于：“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于是产生了晋文化的“复杂”性，“就是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也就是说，“晋国虽然西周的色彩很浓”，但“晋文化不是周人传统，而是北方传统”，“其基础乃是晋南自有源头、自有独立发展历程的当地夏、戎结合的古文化”。

二是王克林先生侧重从晋文化考古的器物群角度，指出“晋文化从它发生到基本同周文化融合为一体，始终是继往开来，兼收并用，逐渐发展成为自成体系和独具特色的文化”。

三是刘纬毅先生指出，三晋文化“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原因，它又不同于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有其自身的特质”；并从“不涉韩、赵、魏，专述山西的历史文化”角度，分析了三晋文化具有“民族融合性”、“兼容并包性”、“地域差异性”和“黜华尚实性”等四个方面的特质。

四是笔者基于山西南北两个小地域文化圈的划分，从西周至战国三晋古文化自身发展的历程概括出“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两大基本特点，进而结合笔者关于“三个历史层面”的理论构架，对两大基本特点作了溯源探流的分析，说明两大基本特点的产生是西周以前山西远古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它又对秦汉以后中国封建文化和山西地区文化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四、关于三晋文化的历史地位问题

所谓历史地位，即是对其在历史上所起作用的确认。从考古学文化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区系类型”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又可以说它是“区系类型”研究的旨趣所归。关于这个问题，大体似应从两方面展开论述：一是纵向方面，即三晋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二是横向方面，即同齐、鲁、楚、秦等文化相

比较，三晋文化在中国古代地域文化之林中的独特地位。这里着重就前一个方面谈谈苏秉琦先生的有关论述。

苏先生主要立足区系类型理论，集中围绕“中国文明起源”亦即“从氏族到国家”的发展历程来讨论晋文化所处的历史地位，也就是“晋文化传统的本质及其所起作用的关键”。他提出了中国文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三大发展阶段。就是说，从距今5000年前升起“中华文明曙光”，开始有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到距今约4500年“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出现了“最早的‘中国’”，进入“方国”时代；再到距今2000年前，历经夏商周“三代”至秦统一，“实现了一统的中国”，由此到达“帝国”阶段，并一直延续了下来。这就是“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发展历程。

在中国文明发展历程中，晋文化“所起作用的关键”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沟通南北”的“天然通道”。中华文明是各大文化区首先并且主要是中原（华山脚下仰韶文化）、北方（燕山北侧红山文化和大青山下河套文化）两大文化区碰撞交错的产物，“没有不同文化的交错，就产生不了中华文明”。而山西境内黄河、汾河、桑干河沿岸和太行山上下便是联结两大文化区的“南北天然通道”，苏先生把它描绘为类似“S”、“Y”或“ ”这样的图形；两大文化区的交错点在汾河、桑干河源头的张家口蔚县西合营，他称之为“南北交通的口子”或“三岔口”。

二是“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这主要指距今约4500年，相当于尧舜时代的晋南陶寺文化。它具有如同“车辐聚于车毂”那样的凝聚力和“综合性质”，把我国北方、中原以至山东、江南的古文化聚合为一体，由此“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出现了最早的‘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的一个重要直根系”。这不仅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发展开拓了道路，而且在后来，“对秦人的统一事业，晋人曾起过‘铺垫’作用”。所以苏先生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至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是促进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社会大转轨”。这主要指根植于山西的北朝文化。为此，苏先生提出“晋文化与北朝文化研究的新课题”，强调“从全新的视角认识北朝文化”。所谓“新视角”，其一是纠正以所谓“五胡乱华”评价北朝文化的偏颇错误观点，充分认识北方民族经由山西这条“天然通道”南下中原的重大意义：不仅促使中原人大规模迁往江南，造成了一个“客家人”群体，更在于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带来了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由此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转轨”；其二，要站在“世界中的中国”视角高度，重新审视北朝文化与晋文化。苏先生以秦岭淮河为界，把中国六大文化区分为南北两半部，北半部“属于欧亚大陆文化圈”，南半部“属于环太平洋文化圈”。指出：“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人文历史方面，北半部所起的作用更重要一些”。这就是说，在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化比之于南朝不仅“并无逊色”，且还“更重要一些”，它不仅带来了中国内陆北方民族的勃勃生机，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活力，且还带来了“欧亚大陆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和各种信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了重要作用”。

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经济效益也需要注意。目前，三晋文化丛书的出版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出版的成果也主要是保存于有关人员手中。这既影响着经济效益，也影响着社会效益。书籍市场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雅士购书藏书，而且代代相传。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文化要求的提高，书籍市场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广大干部、职工、军人、工人、农民等等购书、读书、藏书。甚至举办家庭图书室的也越来越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追求的不是活下去而是要活得好。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既需要具有高素质的人去创造高质量的生活，生产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也需要具有高素质的人去消费。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三晋文化是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利用三晋文化强大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激励力，不仅对，团结教育三晋大地人民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团结教育海外华人也有重要作用。因此，三晋文化要面向市场，适应市场的需求，把研究成果推向市场，这既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扩大社会效益，又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推动研究工作不断健康发展。

四、三晋文化研究应坚持多种形式并举的原则，作到研究和培育“四有”新人相结合。自古以来人们都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把那些追求理想和奋斗不息的人视为“人生楷模”、“民族的脊梁”。但人们的理想和追求千差万别，也有高下之别。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理想。实现

要同楚、秦等立国较晚、相对落后的大国争夺霸权，并不是反对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相反，晋文公不但曾娶狄女为妻，而且他本人亦为大戎孤姬所生。总之，晋国之所以能以原有的区区百里之大的地盘，不断融合诸族，兼并邻国，经过春秋前半期发展，到春秋中期淹有山西全部，至战国中期俨然成为地跨数省的三晋强国，这决不是偶然的。这种政治上的宽容和文化方面兼包的特色，显然也是滥觞于“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方针。

三、三晋文化具有蔑视传统、离经叛道的异端色彩。

这一特色是针对周、鲁、卫等典型的正统宗法制国家而言的。所谓蔑视传统，就是蔑视正统宗法制的礼治传统，所谓离经叛道，就是离封建宗法制的礼乐之经，叛血缘宗法制的“亲亲”之道。西周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一种家国一体、君统与宗统合二为一，“同姓从宗合族属”的血缘实体，由天子至士民等级森严，层层分封，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来确定财产和权力的分配，从而实现巩固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目的，因而，血缘关系是维护社会组织和世道人心的纽带。然而，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在三晋文化体系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观念是较为淡薄的。正由于如此，晋国自春秋早期的昭侯以来，百余年间王位的争夺篡弑史不绝书，并先后发生了曲沃灭晋翼，献公灭桓庄之族和骊姬逐杀群公子等宗族内乱，使晋国公室宗族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维护晋国宗法统治集团的血缘纽带被割断了，从而至晋文公时出现了为其它诸侯国所没有过的异姓卿族专政的局面。也正由于如此，晋国的政治具有了尚贤、尚法、尚公、尚义乃至尚侠等特点，三晋文化呈现出非正统的异端色彩。显然，三晋文化的反正统色彩，同样可以追溯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方针。

总之，三晋文化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方针的基本原理，同三晋大地人文地理和社会环境特定情况相结合的具体历史实践的产物。

三晋文化的道德光辉

山西大学 康金声

重视道德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在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原则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三晋人物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泉和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拟援引正史实事，从以下四个方面阐发三晋文化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辉煌建树。

一、已诺必诚，恩怨分明

1、晋公子重耳出亡时，楚成王待之以礼。重耳临行，答应日后晋楚治兵，如遇于中原，必“退避三舍”以为报答。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时，文公果然退舍，取信于诸侯，亦激励了晋军士气。

2、公元前607年，晋灵公伏甲欲杀赵盾，灵辄为报赵盾一饭之恩，挺身而出，救赵脱险。

3、公元前597年屠岸贾诛灭赵氏，韩厥应赵朔请，答应“不绝赵祀”，与赵朔门客公孙杵臼及杵臼之友程婴合力，终使赵武复继赵氏，其事悲壮。

4、公元前425年，豫让为报智伯待以“国士”之恩，为刺赵襄子，壮烈牺牲。

二、事君报国，忠于职守

1、公元前709年，曲沃武公伐翼，俘哀侯及栾书，武公杀哀侯而招降栾，许以上卿之位，栾拒而斗死（又见《国语·晋语一》）

2、公元597前年，晋楚战于，晋败，知被俘，至前588年，双方交换战俘，楚王问知何以报不杀遣返之恩，知大义凛然，使楚王有“晋未可与争锋”之叹。

3、公元前589年，齐晋战于鞍，晋将克、解张等身负重伤，仍然拼死作战，取得胜利。

三、敬从良善，敦崇清正

1、齐晋鞍之战，齐大将逢丑父为齐侯替身，被俘后鸣冤，晋将军以之为舍身救君的典范，舍之。

2、公元前594年，秦晋战于辅氏，晋魏颗生擒秦将之有勇力者杜回，盖以魏颗此前行善，父歿后遭嫁继母而未使殉葬故也（即所谓“结草”本事）。

3、公元前582年，晋景公见楚囚钟仪，与范文子评钟仪为“君子”，“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4、前573年，晋厉公行乱，栾书弑之而立悼公使晋复霸。

四、尚德重法，正直无私

1、前636年，晋文公赏赐随亡之功臣，介之推不言禄，与其母隐于绵上，至死。

2、前570年晋中军尉祁奚告老退位，为国推荐接替人，一不避仇，二不避亲，一以国家利益为重。

3、同年，魏绛为整肃军容，公平执法，将襄公弟扬干之御仆处死。襄公初极愤怒，欲杀魏绛，及问明委曲，深为感动，竟向绛谢罪，传为佳话。

论三晋古文化的核心精神

山西大学 赵瑞民

三晋古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思想文化即观念形态的领域有集中反映，该领域则在韩赵魏三晋时期有著名的学派及著作，其理论成就在百家争鸣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的讨论即以此为基本范围。

李元庆先生已指出三晋思想文化以法家为主体，以名家、纵横家为两翼，然三家思想学说的内容非常丰富，本文意在探索三家思想的内在联系与其内在一致的基本精神。

法家与名家的相通之处，厥为理性精神。

法家的理性表现在于依法治国的基本立场，对成文法的重视是在治国原则上注重客观性，避免主观随意性。客观性标准虽不能保证社会公正，但比人治的主观取向来说，显然有利于让社会公正的实现。名家的两性化表现则在于概念分析的逻辑思维方式，即使是诡辩的内容，也是运用推理的方式加以充分证明，决无神秘的成分。“刑名”一词既是法家学说内容，又是名家代称，可以清楚地揭示两家的联系。

法家与纵横家的一致之处，在于功利主义。法家学说的终极目的是富国强兵，为此于立国之道只取耕战二途，置人民生活于度外，再者又提倡尊君卑臣，强调任术，排除道德观念与信任关系，一味提倡以权术来统御臣下，认为巩固君主的专制地位可以不择手段。纵横家的功利主义倾向最为明显，“朝秦暮楚”一词是很好的概括。他们的功利目的是个人主义的取向，比法家又落下乘，依附的政权可以不断变换，采用的说辞夸诞不实，只是要达到自己建功立业、攫取富贵的目的。法家与纵横家都是政治活动家，功利主义倾向一致，只有为国家还是为个人的高下之别。

法家是春秋时期晋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出来的思想文化形态，与春秋之晋文化渊源最深。而名家是法家理性精神在理论方面发展的极端，纵横家是法家功利主义在实践方面发展的极端。

因此，三晋古文化的核心精神应是理性精神与功利主义。

。【论文提要】

二十一世纪呼唤“晋学”

——读李元庆先生《三晋古文化源流》

山西师大 张有智

一提及山西，在人们的脑海中就不由得出现两极影象：昔日的辉煌与近世的落伍。

山西，在中国历史上曾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辉煌地区。从政治军事地位来看，春秋时期的晋国由初封时的一块弹丸之地逐渐发展为雄据诸侯的五霸之一，其霸业延续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自此后直至北宋，其间除稍有短暂失落外，这一地区一直是政治军事中心。从经济地位来看，这里在先秦时期的农业、工商业、冶铁业就已十分发达。尤其是明清晋商更是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从文化诸方面的地位来看，法家学派形成于斯，北魏佛教兴盛在此；金代的文化教育和晚清的近代化教育以及元代戏剧的发展也在此地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

可是近世以来，她却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渐渐地落伍了。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山西的历史与文化的积淀过程中积极地探索原因，有关山西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这不仅仅是对辉煌过去的一种追念、关怀，而在在我看来更是对未来的发展再度辉煌的一种追求和渴望。

昔日的辉煌实际是文化的进步。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改革开放的进取精神、举贤任能的人才观念等等是创造辉煌的内在动因。近世的落后关键是文化的落后。我们应努力加强晋文化、三晋文化以及山西文化的研究，找回失落的优秀文化传统加以弘扬。李元庆先生在他的新著《三晋古文化源流》中提出建构“晋学”的设想，便是对引深三晋文化研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呐喊。

我赞成李先生的说法，“晋学”即“晋文化学”。它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晋学，应包括晋文化、三晋文化和山西文化的研究；狭义的晋学，应指春秋时期的晋国文化研究。本文采用广义晋学之说。它研究的范围当是整个山西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大凡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宗教、文学、艺术、教育、民俗等均应包括其中。

二十一世纪是东亚腾飞的世纪，也是中华民族腾飞的世纪。机遇与挑战严峻地摆在山西人的面前。现代化的关键是文化的现代化，人是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山西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山西人的观念和素质的现代化，特别是领导人物的观念和素质的现代化。所以，认真反思历史，挖掘和分析三晋文化中的优劣成分，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排除山西人性格中的劣根性，增强人的现代化意识以及实现现代化的使命感和迫切感，重振三晋雄风，是晋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为此，我们应从山西发展战略的高度审视晋学研究，为二十一世纪的山西振兴做出贡献。

呼唤“晋学”或“晋文化学” 是深入拓展三晋文化系列研究的客观需要

山西社科院 高增德

80年代，曾有过“文化热”，除了它的负面影响外，也不应否定它之正面的促进作用。从那以后，不仅各地的古文化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产生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文化史研究著作。

作为中国古代区域文化的研究，吴越、荆楚、齐鲁等地区，不仅起始较早，而且形成了规模系统，有了重要的突破。作为三晋文化研究，继先进者之后，也有了一定的起色，其重要标志，除了已有组织性作用外，在认识上亦有了飞跃性的提高，正在自觉地改变以整理资料为主的局面，向着以研究为主甚至规模研究发展。

专著《三晋古文化源流》的出版，可视为一种自觉。难能可贵的是著者在研究理论等方法上的基本运用，以“三大理论层次”为遵循，注重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三个层次上展开他的三晋古文化的研究。同时他在书中明确地提出构建“晋学”或“晋文化学”的主张和呼吁，余以为具有意义有价值的。著者这样说：

“笔者认为，根据三晋古文化研究业已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从构建‘晋学’或‘晋文化学’的客观需要出发，在大力开展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展开和深化对以下各基础性分支学科的微观研究和探索，具有十分迫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主要就是关于以山西省境为中心的晋与晋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文化地理学、历史学以及民族文化史、民俗文化史、宗教文化史、思想文化史、科技文化史、艺术文化史、商业文化史、制度文化史等等，等等。可以设想，一旦微观层次研究呈现出以上多种学科携手并进的局面，那就是说，宏观和中观层次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深化了，微观层次的研究也已经全方位地拓展了，‘三大理论层次’的研究已经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在这种局面下，极力呼唤的‘晋学’或‘晋文化学’的历史课题也可以说已经‘呼之欲出，或者毋宁说已经诞生了’，构建‘晋学’或‘晋文化学’的历史课题也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了。因而丰形之下，微观层次的研究将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内容。”（见《三晋古文化源流》第46页）

我所以大段引用了这段论述，一则著者已将“晋学”或“晋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交待清楚了，二则既可看出“晋学”或“晋文化学”与“楚学”或“楚文化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差距，也可见“晋学”或“晋文化学”与“楚学”或“楚文化学”在研究成就上的悬殊。进行过这样的比较与反思后，必将促使“晋学”或“晋文化学”改变自己的研究现状，在进入21世纪时有一个新的改观，踏上一个新的阶梯。

晋与三晋国家的文化在中华古文化总体中的地位和影响

长治教育学院

秦培华

一、

中华古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复合体，它包含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不同流派的文化要素。

(一)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含着十分宽泛的内容。从衣、食、住、行、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到文学、艺术、民俗、风情、科学、教育、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乃至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莫不属文化。

(二) 自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特定的民族生活土壤里滋生出富有特征性的中国古代文化。

(三) 群雄蜂起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活跃景象。

二、

晋与三晋国家的多民族文化在中华古文化总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 晋与三晋国家地处黄河流域，属于华夏族，从历史的眼光看，华夏族的中原文化当是中华文化这条巨流的主干。(上溯最早出现了山西万泉的粮食作物：高粱黍黍，最早发迹于山西西南的唐尧虞舜；下睹春秋时的霸主晋文公，战国时合纵主体的韩、赵、魏)

(二) 思想文化：

1、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变法是战国初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李悝编著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出身于韩国贵族的韩非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2、出生和思想形成于赵国的荀子。

3、晋文公、梁惠王等国君，平原王、信陵君等国相卓著的功勋。

4、赵武灵王亲自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这是我国中原地区最早的正规骑兵，庞涓、廉颇、赵奢等对军事文化的贡献。

5、魏国贵族后代张仪的纵横谋略。

(三) 科学文化

1、战国中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魏人石申与齐人甘德所测定的恒星纪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2、战国末韩国水利家郑国受韩命赴秦开凿著名的“郑国渠”。

(四) 文学艺术文化

1、唐虞时代，山西晋南已流传不少诗歌，如后人追记的《卿云》、《南风》、《康衢》、《击壤》等便是当时人们口耳相传的远古歌谣。

2、屡被先秦典籍所称道的《大章》、《大韶》、《大夏》也是在三晋大地传响的“尽善”、“尽美”（《论语》）的优美乐章。

3、《诗经》中的“风”共一百六十篇，其中有《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约占“风”的百分之十二。特别是在思想上所达到的高度，完全可以作为“风”诗和全部《诗经》的代表而无愧色。著名的《伐檀》、《硕鼠》可说是“三百篇”时代的最强音。

三、

晋与三晋国家的文化对中华古文化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随着民族的大融合，中原文化也在逐步地吸收与同化周围的“蛮夷”文化。黄河流域地区各民族与其周围的少数民族互相通婚，互相学习，风俗习惯及语言文学逐渐融合。如晋文公重耳的母亲便是大戎狐姬，属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公被推为华夏诸邦的盟主后，更扩大了中原文化的辐射面。

（二）战国时代，随着诸子百家的蜂起，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复杂的多元化的发展，三晋文化加快了向外传播和流动的步伐。以自身具有的较高品格，影响着长江以南等其它尚未进入中国文化范围的广大地区，以华夏文化为中轴繁衍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关于三晋文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长治晋东南师专 李仁和

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对推动山西的文化研究起了很大作用。但从整体来看，与现代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还不适应，某些研究与文化研究尚有相当距离。本文欲对此作一剖析，以对山西文化研究有所裨益。概言之，有如下五点：

一、应在文化研究的范畴内研究，特别应分清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区别，分清历史与民间传说的区别。

二、应注意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理论分析研究文化现象，特别应防止封建文化观念的侵蚀，克服收集优点的“夜郎自大”式的做法。

三、明确文化研究的宗旨，围绕此目的作纵横两方面的研究。

四、要注意吸收外域先进的文化研究方法。

五、研究会虽称“三晋文化研究会”，但似以现山西省为研究范围为佳，因韩、赵、魏已多涉冀豫蒙等省，且秦以后山西大致已成一文化地域。

试论三晋文化研究的原则及方法

吕梁地区三晋文化研究会

刘振华

三晋文化源远流长，涉及范围广，在中华古文化总体中占有重要地位，享有重要影响。因而，研究三晋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研究会的积极努力和有志研究人员的顽强拼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三晋文化研究仍不适应社会需要，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三晋文化研究的关键在于研究。但研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发扬三晋文化，服务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而，如何研究不是一般的方法，而是一个重要原则问题。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思考，就三晋文化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一些不成熟意见。和专家、学者商榷。

一、三晋文化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做到收集、整理、研究相结合。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体系，内涵丰富、系统而完整。只有运用此方法才能对历史史实或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特征及有关问题作出明确而又科学的分析。否则，就看不清也